

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

〔宋〕李 覲 撰 王國軒 點校

李 覲 集



NLIC 2970717053



中華書局
ZHONGHUA BOOK COMPANY

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

李
覲
集

中
華
書
局



〔宋〕李
覲 著
王國軒
點校



NLIC 2970717053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李觀集/(宋)李觀著;王國軒點校. -2版. -北京:中華書局,2011.2

(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)

ISBN 978-7-101-07141-2

I. 李… II. ①李…②王… III. 李觀(1009~1059)
-文集 IV. B244.1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223886 號

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

李 觀 集

[宋]李 觀 著

王國軒 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9½印張·2插頁·370千字

1981年8月第1版 2011年2月北京第2版

2011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數:6801-9800冊 定價:58.00元

ISBN 978-7-101-07141-2

前言

李觀（公元一〇〇九年——一〇五九年）字泰伯，北宋建昌軍南城（今江西省南城縣）人。他是北宋著名思想家，儒學功利派的先驅，「慶曆新政」理論上的支持者，王安石變法的先導。後人評論說：「道德文章，卓絕一世，且多所著作，學者皆斗山仰之，蓋屹然爲宋代儒宗。」（陸瑤林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）

李觀少年時，家境即已衰敗。兩次應試不中，晚年由范仲淹等人薦爲試太學助教，後爲直講。他一生以教授爲業，從學者常達數十百人，創建盱江書院，故又被稱爲「盱江先生」。

李觀在青年時代，就勤奮好學，關心時政。二十二歲開始寫作，後來不論教學和著述，處處以「康國濟民爲意」。他的著述大都是「憤吊世故，警憲邦國」的政論，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，被譽爲「皆從大處起議論」的「醫國之書」。他的筆鋒所向，具有強烈的戰鬥性，實質上都是對北宋中期社會的政治批判和學術思想批判。其中，潛書、廣潛書、禮論、周禮致太平論、慶曆民言以及富國、安民、強兵等策，反映了他的政治、經濟、法學、軍事等主張和思想，易論和刪定易圖序論表達了樸素唯物主

（一）其出生地在今江西省資溪縣。

義自然觀。

關於李觀的思想，下面重點介紹一下他的經濟思想、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，同時兼涉一些法學思想和軍事思想。

李觀的經濟思想，從當時看，是比較豐富的。他幾乎探討了封建經濟的各方面問題，如土地、勞力、徭役、賦稅以及農商關係等。

李觀把土地問題看作社會問題的根本。北宋中期，皇室、官吏和豪強大量兼併土地，到宋仁宗時，已是「勢官富姓，占田無限，兼併冒僞，習已成俗」（宋史食貨志），形成了「富者日長，貧者日削」，貧者「耕不免饑，蠶不得衣」，富者「穀陳而帛腐」的尖銳對立狀況。李觀揭露了這種狀況並分析造成的原因，認為農民所以難免於饑寒，是由於「土非其有」。他說，「生民之道，食爲大」，但最根本的還是土地，「土地，本也；耕穫，末也」，沒有田地而讓農民耕種，「猶徒手而使戰」（平土書序）。無土無食，禮義也無法約束饑餓的農民。這樣，李觀就把土地問題作爲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根本問題，鮮明地提出來了。

那麼，怎樣解決土地問題呢？李觀提出了「平土」，即「均田」的主張。他認為只有「田均」，才能「耕者得食」，「蠶者得衣」，就是說，只有做到均田，貧窮的人才能衣食自足，才能充分發揮人力和地力，達到「民用富而邦財豐」的目的。

在平土書裏，李觀依據經他美化的周禮田制，提出了均田的具體方案，描繪了理想的藍圖。按着

這個方案，一夫除宅田外，還可以得田百畝。王室、貴族、官吏占田均有定數，不許隨意擴占。國家「以官地爲溝途，不害民田」。他把這些稱之爲「損上益下之義」。「損上益下」這一思想，貫穿於李觀的全部經濟思想中，這裏則包括「均田」和「限田」的雙重內容。「均田」，是希望國家把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，以便定其居處，使之樂業，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，緩和他們的反抗。「限田」，則是通過限制貴族、官吏占田，抑制兼併，達到保護中小地主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經濟利益的目的。

李觀還指出，發展生產還必須解決人力的問題。措施是「行抑末之術，以驅游民」（富國策第二）。「游民」包括「末者」和「冗食者」。「末者」是指工商，「冗食者」則是指釋老、冗吏、巫醫卜相、倡優百戲等。李觀認爲，只有使他們「復之有業」，社會秩序才能歸於安定，並使「富家役使者衆」，得到更多的勞動力，從而作到「人無不耕」，「地無不稼」。

在富國策第六中，李觀還從農商關係上，提出如何防止巨商大賈兼併的問題。他指出，農民勞作之苦甚於疾病，因而對於自己勞動成果十分珍惜，「愛其穀，甚於生」。但是，由於「具服器」、「營婚嫁」、繳納賦稅以及償還借貸等，不得不「一穀始熟，腰鎌未解，而日輸於市」。但由於商賈操縱物價，不論賣出或買進，受到損害的還是農民。「農之糶也，或闔頃而收，連車而出，不能以足用。及其糶也，或倍稱賤賣，毀室伐樹，不能以足食」（富國策第六）。農民不能「足食」、「足用」，而商賈却「甚逸」、「甚饒」。針對這種情況，他指出，「人君理財」，要禁止「蓄賈專行」，以「舒貧窶而鉗兼併」（國用第十一）。主張用平準、平糶等方法，加強國家對商業的控制，限制商人對市場的壟斷。

徭役和賦稅的繁重，是北宋經濟中僅次於土地的重大問題。皇室的驕奢，官吏隊伍的龐大，戰爭失利後向敵方進獻歲幣，使國家財政幾乎達到崩潰的地步。爲了應付龐大的開支，北宋政府通過賦稅加緊對人民的搜刮。宋代實行的兩稅法，不僅要交納貨幣，還包括品種繁多的實物，這就給農民帶來了更大的負擔。北宋的徭役，名目雜出，征調頻繁，加之官僚、豪強、商人、寺觀都有免役特權，徭役幾乎全部落在農民和小地主肩上，給他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。

針對賦役的繁重，李觀主張：一、「薄稅斂」。「稅輕者不減二十而一，重者不逾十二，皆以役多少參折之」（平土書）。二、「平其徭役，不專取」（國用第十六）。就是說，對於中小地主，不能「任之重，求之多，勞必於是，費必於是」（國用第十六）。對於官僚地主，本人可以不服役，但不能「一戶皆免之」。這實際是要求減輕中小地主的過重負擔，而對官僚免役特權進行限制。三、防止官吏厚斂。他說，一般官吏的常態是「虧下以益上，貪功以求賞，不恤人之困乏，皇皇以言利爲先」，因此，帝王應掌握全國土地、山林、川澤、六畜、器械等基本情況。主管官吏在穀物將熟時，應巡視田野，「觀其豐凶」。要按照「豐年從正」，「凶荒則損」的原則制定稅額。這樣，官吏就不敢厚斂了。若遇上水旱、瘟疫災害，國家不僅要「除減田租」，而且要免徵各種實物，以減輕農民的負擔。

李觀的理財思想也是很有價值的。他一反儒家「貴義賤利」的傳統觀念，大胆地指出：「治國之實，必本於財用。蓋城廓宮室，非財不完；羞服車馬，非財不具；百官羣吏，非財不養；軍旅征戍，非財不給；郊社宗廟，非財不事；兄弟婚媾，非財不親；諸侯四夷，朝覲聘問，非財不接；矜寡孤

獨，凶荒札瘥，非財不恤。禮以是舉，政以是成，愛以是立，威以是行。舍是而克爲治者，未之有也。」（富國策第一）這就等於把封建國家的政治、法律、軍事、外交、道德、文化、禮教及一切封建秩序，全部放置在「財用」的基礎上。

那麼怎樣理財呢？李觀認爲，決不應巧籌算，析毫末，「厚取於民」，而在於「強本節用」，「量入以爲出」，即發展生產，節約開支，根據國家收入，制定用財計劃。在國家困難之際，應從帝王開始，實行「不傷財，不害民，損上益下之道」，厲行節儉。在財政支出上，要按「量入以爲出」的原則行事。人，不能像暴君那樣誅求無已；出，「凡一賦之出，則給一事之費，費之多少，一以式法」，不能用財無法，奢侈無度。

總之，李觀的經濟思想，有着廣泛的社會內容和特殊的時代特色。他所探討的土地、賦稅以及財用等問題，都是北宋中期社會的重大問題。他的經濟思想如果付諸實踐，對於發展生產力，是會有益的。但實行改革必然要觸犯貴族官吏的利益，一定要受到他們的阻撓和反對。

北宋慶曆二、三年間，在內外矛盾急遽發展的形勢下，以范仲淹爲代表的革新派在宋仁宗的支持下，實行改革，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「慶曆新政」。李觀是「慶曆新政」的熱情擁護者，他的政治思想大都是從改革時政出發的。

在慶曆民言中，李觀把「開諱」作爲改革政治的前提。所謂「開諱」，就是除掉忌諱，廣開言路，正視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，鼓勵臣下諫諍帝王的過失。他說：「聞死而愠，則醫不敢斥其疾；言亡而怒，則臣不敢爭其失。疾不治則死，或非命；失不改則亡，或非數。」（開諱）這些議論，在國家存亡間

題上堅持了人事的作用，即君主實行政策的好壞，對於因循苟且，鉅制輿論，指目新進敢言之士爲朋黨的社會風氣來說，也是一種大胆的指斥。

「備亂」是革新政治的重要出發點之一。李觀根據歷史的經驗，認爲致使國家亂亡的勢力有兩種，一是「盜」，二是「姦」。他認爲，「盜」不能成大患，而「姦」因「盜」之勢，以殺「盜」爲名，籠絡人心，就會形成與朝廷抗爭的勢力，並有可能取而代之。因此，帝王居治世，也應當謹慎從事，慮亂於治，杜「盜」防「姦」，這樣才能保持統治。

李觀還提出「慮永」，即長遠打算的原則。他認爲，天下禍患都是漸漸積累起來的。因而，亡國之君之所以滅亡，並不一定因爲他本人有什麼惡行，往往是積久造成的。因此，他要帝王「舍近而謀遠」，爲子孫慮，爲萬世計。

在「開諱」、「備亂」、「慮永」的前提下，李觀提出了許多進步的主張，其經濟方面，已如前所述。下面我們還將分別敘述其法律、軍事等方面的見解，這裏着重談談他對改革吏治方面的一些思想。

北宋中期，官吏冗濫腐敗，人數之多，可爲列朝之冠。僅科舉錄取的名額就超過了唐代二十倍以上。「恩蔭」制度又使皇族、外戚、品官的子弟獲得官位。高官顯宦不僅要蔭及嫡系子孫，還可蔭及宗族親屬乃至門客醫生，從而形成了「比屋皆是衣冠」的龐大官僚隊伍。這些官吏俸祿優厚，享有占田免役特權，大都田舍彌望，婢妾成羣，過着荒淫腐化的生活。官吏中許多人老朽、病患、貪污、無能。龐大的官僚機構，真正成了社會機體上一個臃腫不堪的贅瘤。

李觀對於這種狀況有較深刻的認識。他描繪貪官污吏的丑態是「希勢而懼，懷賂而喜，妥首擺尾」，簡直使「良犬」都爲之羞恥。他把攀結權貴，爬上高位，狐假虎威的人看做「盜賊」，並警告當權者，不要做這種盜賊的「人質」。他斥責某些居高位的人不能圖國忘身，只是「但行文書，不責事實，但求免罪，不問成功」；前後相推，上下相蔽，得過且過，敷衍度日而已。

爲了刷新吏治，李觀在慶曆民言中提出了「效實」的用人原則。根據這一原則，他主張，考核基層官吏應以「土田墾闢，稼穡蕃滋，百姓樂業而無冤人」爲標準，成績顯著者，書之以功，反之以罪。

李觀不滿意當時憑年資叙遷官吏的辦法，指出：「官以資則庸人並進。」（長江賦）他責問道：「不求功實，而以日月爲限，三年而遷一官，則人而無死，孰不可公卿者乎？」（官人第三）對於「不問其功，而問其久」的考績方法，李觀譏爲「故妄庸人，一出選部，雖枯其手，雖鉗其口，而尊爵自至」，就是說，只要一做上官，即使什麼事也不做，什麼主意也不出，無絲毫政績，也可以按年資升遷。

李觀對僅憑一紙試卷，專以詩賦聲病、記誦默寫而取官的科舉考試方法，也一再地提出指責。他認爲，這種只憑空言選拔人材的方法弊病很多，既不能知其德操，又不審其幹事能力，「才不才，決於數百言」（官人第一），「一語不中，則生平委地」（上范待制書），必然要遺棄人材。因此主張要「試之以事」，「事讎其言，然後命其官」（慶曆民言）。李觀這些主張，對於廓清吏治，識別姦佞，鼓勵新進，選拔人材是極爲有益的。

在李觀的著作中，還反映了一些法學思想，這裏概括地作一點介紹。

李觀的法學觀點是以防範、懲治「盜賊」，即農民反抗鬥爭爲宗旨的。但由於他所處社會地位以及時代矛盾的多樣性，他的法學思想還表現出限制打擊不法貴族和豪強的一面，這就是李觀針對宋代「法禁怯而不禁豪」，提出了「不辨親疏，不異貴賤，一致於法」的主張（刑禁第四）。這一主張反映了要求限制官僚大地主政治特權的願望和呼聲。

李觀還反對衣冠子孫以金錢贖罪，認爲這只能助長他們傷害平民的氣焰。對於普通民衆犯法，他主張，重者可以監禁，罰以勞役，但一般不加重刑傷殘肢體。在災荒年月，民衆迫於饑餓，常常鋌而走險，這時刑罰就應放寬些。在執法寬猛問題上，主張要善於「適時之變」，根據不同的政治形勢，採取不同的刑典，不能固守一策，膠柱鼓瑟。

李觀強調斷獄定罪要採取審慎態度。認爲即使聖人折獄，「猶恐聰有所不聞，明有所不見，下情有所不達，議法有所不平」（刑禁第二），因而一般人要做到正確斷獄，必須要廣詢於衆，「羣臣、羣吏、萬民之意同」，才可以刑殺，這樣方可免傷無辜。這種謹政思想，對於維護法令的權威性是有作用的。

李觀青年時代就熱衷於軍事的研究，這是同北宋內憂外困的政治形勢相關聯的。

當時，宋王朝北部和西部連連遭受遼和西夏的侵擾，內部又不斷爆發農民起義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銳。面對嚴重的現實，李觀在強兵策等文章中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針對北宋軍隊缺乏訓練的弊病，指出軍隊必須經常訓練。認爲兵不在多而在精，與其多，無如「芟其冗，轉其資」，厚敢死。對於將帥，主張要用之不疑，「無置節目於其間」，取消近臣監軍，給將帥以獨立的指揮權，使其在一步

百變的戰爭中，能「獨行」，「自恣」。將帥還要撫恤士卒，做到兵知將心，將知兵力，這樣才能提高軍隊的戰鬥力。在軍隊建制問題上，李觀主張除中央直接控制禁軍外，還必須實行「鄉軍之法」和「屯田之法」，從而做到「屯軍以征戎，鄉軍以守備」。在戰略戰術上，李觀提出了「本末相權」的原則。他說：「仁義者，兵之本也；詐力者，兵之末也。」「本末相權，用之得所」，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。對於外族統治者侵擾的問題，李觀針對他們「強則犯上，弱則離散」的特點，認為必須本着「修諸內而後行諸外」的原則，採取「權制」，即機動的原則。並根據歷代實邊的經驗和教訓，提出了具體的鬥爭策略。

李觀是一個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，這一傾向，在他思想的各個方面都有體現。這裏着重談談他的自然觀、認識論以及無神論等思想。

李觀把自然界的一切，看作是由陰陽二氣會合而成的。他說：「夫物以陰陽二氣之會而後有象，象而後有形……天降陽，地出陰，陰陽合而生五行，此理甚明白。」（刪定易圖序論論一）這種認為由氣構成萬物的思想，正是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一個特徵。

李觀還突破了以往對乾卦卦辭「元、亨、利、貞」的解釋，對此作了唯物主義的說明。他說：「若夫元以始物，亨以通物，利以宜物，貞以幹物。……始者，其氣也。通者，其形也。宜者，其命也。幹者，其性也。走者得之以胎，飛者得之以卵，百穀草木得之以勾萌，此其始也。胎者不殯，卵者不殯，勾者以伸，萌者以出，此其通也。人有衣食，獸有山野，蟲豸有陸，鱗介有水，此其宜也。堅者可破而不可軟，炎者可滅而不可冷，流者不可使之止，植者不可使之行，此其幹也。」（刪定易圖序論論五）對乾卦

「元、亨、利、貞」這樣的解釋，就等於把自然界一切生物，包括人類、走獸、飛禽、蟲豸、鱗介，乃至百穀草木，都看作是由物質性的氣生成的，並在氣的作用下，胚胎、萌芽、生長、壯大。這種把自然界看成是由某種物質產生出來的東西，某種發展起來的東西，某種逐漸生成的東西的觀點，不僅是樸素唯物主義的，而且具有樸素辯證法思想。

李觀思想可貴之處，還不僅在於他直觀地看到了世界的物質性，而且還猜測到物質世界內部的對立性。他認為，構成自然界的氣並不是單一的東西，而是有陰陽兩種，只有這兩種氣的相互作用，才能產生萬物。否則無論是單一的陽氣，還是單一的陰氣，都是無法生成萬物的。他問道：「天以陽高於上，地以陰卑於下，天地之氣，各亢所處，則五行萬物何從而生？」（刪定易圖論論一）他還用男女不合婚，無以生子女為例，論證事物必須由陰陽二氣會合而生，這就在萬物起源問題上，猜測到事物是對立的兩個方面組成的。不能不說是一種樸素的辯證觀點。

客觀世界是物質的，那麼人的認識和物質世界的關係是怎樣的呢？李觀承認主觀的東西是來自客觀的。他指出，「夫心官於耳目，耳目狹而心廣者，未之有也。耳目有得則感於心，感則思，思則無所不盡矣」（慶曆民言廣意）。又說：「性不能自賢，必有習也；事不能自知，必有見也。習之是而見之廣，君子所以有成也。」（易論第四）這就是說，人的思想來自感覺，而感覺的產生又是由於外界事物對感官的作用。感官「有得」，才能有感、有思。人的思想、認識、品德，都是廣泛地學習的結果。這就肯定了人的知識、才能是先天固有的先驗思想，在認識論上，體現了樸素唯物主義思想。

李觀還提出了「權者，反常者也」的命題，探討了事物的常規性和變動性的關係。他說：「常者，道之紀也。道不以權，弗能濟矣。是故權者，反常者也。事變矣，勢異矣，而一本於常，猶膠柱而鼓瑟也。」（易論第八）又說：「若夫排患解紛，量時制宜，事出一切，愈不可常也。」（易論第八）指出要因時制宜，可則因，否則革，只有這樣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。

李觀特別強調「救弊之術，莫大乎通變」（易論第一）。反對襲故蹈常，盡循前代政令。這種「通變」思想，表達了改革者的願望，是李觀改革思想的基礎，也是從理論上對當時改革運動的一種支持。李觀是一個無神論者，他對佛道二教是極力排斥的。自漢魏以來，佛道二教在統治階級提倡下，逐步發展起來。到了北宋，特別是在宋真宗的倡導下，更是山林遍布寺觀，緇黃充斥天下。李觀尖銳指出，崇信佛道有「十害」，排除則有「十利」。認為排除佛道是使人民樂業、國家富強的「萬世之策」。他提出了「止度人而禁寺觀」的主張，表現了一定的戰鬥精神。

李觀除對佛道排斥外，還對神仙方士、巫醫卜相、吉凶禍福、圖讖五行、鬼神迷信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批判。

他斥責漢武帝延方士、築宮館，以求神仙。用不經之言，以東封泰山，禪梁父。漢光武帝「不師經籍」，而聽用圖讖之書，以疑天下耳目。唐太宗因循駁雜，浮屠亂法而不知禁。唐明皇興起老子、莊周之說，以害教化。認為這些帝王在歷史上的政績，並不是上述迷信活動的結果，而是由於求輔佐，納諫諍，夙興夜寐，「濟生人爲意」而取得的（禮論第七）。這些議論，實際上直接指向了宋真宗倡導佛道、

尊天事鬼等迷信活動。這種激烈的反迷信思想，承襲了前人無神論的戰鬥傳統。

李觀對於儒家經注，也盡力洗刷其迷信色彩。他批判鄭玄注中庸的性命之說廣求人事以配五行，指斥樂記例多闊大，其意汪洋，其文以舊說爲陳熟，以虛詞爲微妙，出入混沌，上下鬼神，使學者觀之，「耳目驚眩，不知其所取」（禮論第六）。認爲「聖人作易，本以教人」，批判「世之鄙儒，忽其常道，競習異端」，請求象數，出入佛老，「晝讀夜思，疲心於無用之說」（易論第一）。他以平凡實際的人事，解釋易義，拋棄幽微、誕謾的謬說，隨處透露出唯物主義光芒。這些充滿戰鬥精神的批判，打破了儒學彌漫的沉悶空氣，成了後來功利派的先河。

李觀還批判了「五行相生則吉，相克則凶」的迷信說教。指出「相生未必吉，相克未必凶，用之得宜，則雖相克而吉」，如水克火，發生火災時，用水救火，不是凶而是吉。反之，「用之失其宜，則雖相生而凶」（刪定易圖序論論六），如水生木，以水浸木，木可致腐。這種以具體條件爲轉移的「吉凶」論，不單單批判了迷信說教，而且直觀地看到了事物對立面的轉化和轉化的條件。

李觀的思想，不僅是當時社會條件的產物，而且還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根源。李觀多方面地汲取了前人的思想，具體地說，其倫理觀，主要是繼承了儒家的綱常名教觀念。其經濟思想，則是以周禮爲思想資料，並雜糅管子、商鞅、韓非等富國強兵、重農抑商的主張。在軍事上，除改造周禮外，還從孫子、管子、商君書、司馬法以及歷代實邊政策中攝取營養。其法學觀點，則繼承了韓非、商鞅的「刑無等級」（商君書賞刑）、「刑過不避大臣，賞善不遺匹夫」（韓非子有度）等思想。其哲學思想則是以周易

爲資料，以王弼周易注爲基礎而加以改造，從客觀唯心主義轉向了樸素的唯物論。其無神論觀點不僅繼承了荀況等對於鬼神卜相等迷信說教的批判，而且直接吸取了韓愈排斥佛教的思想。當然，所謂吸取繼承，並不是依樣照搬，而是結合現實有所改造，有所豐富，因而具有求實的特點和強烈的針對性，散發着時代的氣息。

李覲一生都沒有處在政界中，似乎並沒有充滿驚濤駭浪，但却是不得意的，是在憂患和矛盾重重中度過的。他的思想也和他人的人生一樣，充滿了矛盾。面對貧弱不堪的國家現狀，他自稱「狂夫」，奮起呼籲，但生活却没有給他實現抱負的機會。對於農村的悲慘現實，他爲之哀嘆，爲之不平，却又害怕農民掀起抗爭的風暴。他一面勸告皇帝實行節儉，一面又主張「王之后之用財，皆不會計」，爲封建帝王開方便之門。他一面沉痛地控訴豪右的橫行不法、侵掠兼併，一面又主張在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刻重用他們，並發揮其作用。長期的農村生活使他真切地看到了現實的社會危機，同時也束縛了他的眼界。但無論怎麼說，他畢竟是北宋中期革新運動中一位有見識的思想家。他的思想對當時東南士人有着不小的影響。他的學生鄧潤甫參加了王安石變法，而他本人也曾受到王安石的稱贊。他的功利觀，成爲叶適「既無功利，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」這一著名思想的先驅。他對儒家經注的非議，爲顏元、李塉對宋儒的批判開闢了道路。他的著作是研究北宋中期社會的寶貴資料。

王國軒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

二〇〇九年十月修訂

校點說明

李觀集舊稱直講李先生文集或盱江文集。李觀在世時，曾先後自編退居類稿十二卷、皇祐續稿八卷，並付梓行世。慶曆三年，其友祖無擇曾爲其退居類稿作序，李觀亦有自序，序中說：「自冠迄茲十五年，得草稿二百三十三首，將恐亡散，姑以類辯爲十二卷。」據宋史本傳載，熙寧中，門人鄧潤甫曾上退居類稿、皇祐續稿並後集於朝廷，但宋史未著卷數。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李觀的著作有退居類稿十二卷、續稿八卷、常語三卷、周禮致太平論十卷、後集六卷，總計三十九卷，並說後集爲門人傅野所編。南宋理宗景定二年，張淵微在李觀年譜後記中說：「魏峙讀李觀書，「恨年譜有遺缺，字畫有訛脫，更與盱之士參以它書讎正」。看來在宋理宗以前，李觀文集已附有年譜，具有了現行文集的規模。

現存的李觀文集，是明代成化年間左贊編刻的。這個刻本，對常語作了刪節，被刪去的部分在宋余允文的尊孟辨一書中還可以看到，清黃宗羲的宋元學案也保存了幾條。

這次整理用的底本是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左贊刻本。參校了明正德十三年孫甫刻本（簡稱正德本）、萬曆孟慶緒刻本（簡稱萬曆本）、清光緒二十九年謝甘棠刻本（簡稱光緒本），此外還參考了宋呂祖謙編的宋文鑑、清吳之振編的宋詩鈔所收李觀詩文。本書涉及周禮、禮記、周易等書的